



比较政治发展报告

Report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Development

比较政治理论的发展与反思 ——暨中国制度研究论坛2012

No. 03 2012/11

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

THE DR. SEAKER CHAN CENTER FOR COMPARATIVE POLITICAL DEVELOPMENT STUDIES

比较政治理论的发展与反思 ——暨中国制度研究论坛 2012

（此报告根据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 2012 年 11 月 24 日举办的“比较政治理论的发展与反思——暨中国制度研究论坛 2012”研讨会会议记录整理而成，特此向各位贡献者表示感谢！）

2012 年 11 月 24 日，“比较政治理论的发展与反思——暨复旦大学中国制度研究论坛 2012”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逸夫科技楼二楼多功能厅顺利举行。此次论坛由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中央编译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4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明明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致欢迎辞，他代表国务学院热烈欢迎各位学者和专家来参加学院的年度“重头大戏”，并回忆了在求学期间深受比较政治学的训练和影响的过程，指出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对帮助和促进自己国际关系研究的作用。陈志敏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曹沛霖老师开创了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把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发展好。国务学院更希望借助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和其他多种平台，与更多的国内外学者进行深入的交流。

研讨会随后进入专题研讨阶段。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论坛的“国家与政体转型的比较研究”、“国家与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前沿趋势”和“公共治理与政治经济的比较研究”四个专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

专题一：国家与政体转型的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主持专题讨论，复旦大学政治学系陈明明教授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正毅教授担任学术评议。⁴

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的报告主题是《QCA vs. 回归：以 26 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为样本》，他以 26 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转型经历为样本，在 Pop-Eleches 的研究的基础上，比较 QCA 和统计回归的优劣。他认为 QCA 对于处理一些能够相对确定地被类别、定级地 code 的数据和事件更加有效（比如一个国家的外交危机的处理方式、结果，战争是否爆发等等。通常，这些事件的数量都不是很大，很适合 QCA）。而因为 QCA 能够给出因素组合（configuration），因此，它给出的一些结果对于寻找更好的解释（包括含有机制性的解释）非常有用，为下一步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但是 QCA 也确实有很大的局限性：无法处理 time-series，更谈不上 Panel data。

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对比了“政体思维”和“政道思维”。他提出在探求理想政治秩序的过程中，中国与西方的思维方式未必相同。通过西方政治思想的梳理，王绍光教授指出政体（Politeia）在西方政治分析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政体对政治共同体生活各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比较政治中，政体即被作为被解释对象，也被作为解释变量。而中国缺乏政体分析传统，关注政道。王绍光教授分析了“道”与治国理政相关意思的三方面含义，梳理了中国政道思想。他最后对比了政道思维和政体思维，认为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最关键的不同是视野的宽窄，中式的政道思维不会陷入制度决定论，更不会陷入政体决定论。

香港浸会大学陈峰教授以“国家与劳工权利的建构:比较的视角”为主题进行了报告。他首先提出核心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导致工人运动，中国为何是个例外？陈峰教授从劳工权利的建构路径来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比较分析基于两个视角：“工人运动兴起时所面临的制度环境”

和“国家对工人运动的制度性反应”。与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威权国家不同，中国劳工权利构建的路径特点是“建立个人权利，限制集体权利。”这是由于一方面中国缺乏西方工人运动发生的初始条件和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具有远远超过一般威权政府的控制和渗透能力，不存在工人自主运动的空间。

复旦大学包刚升博士的报告主题是《国家重构、组织化暴力与政治转型——1911-1937年中国民主转型为什么会失败？》。他提出了一项新的理论解释：政治转型的起点会影响转型的任务、路径与结果。当民主转型与国家构建同时进行，国家构建或重构通常具有政治上的优先性；国家构建或重构的核心是政治统一，而政治统一的核心是垄断暴力，因而控制最强组织化暴力的政治集团将成为国家构建或重构的领导力量；如果以非民主方式组织的政治集团能控制更强的组织化暴力，国家构建或重构的过程往往会对民主转型过程形成压制；国家构建或重构的成功，往往意味着民主转型的失败。包刚升博士认为，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同时面临构架国家重构和民主转型的双重任务时，“国家重构压倒民主转型”。

专题二：国家与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

第二个专题讨论“国家与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由香港浸会大学陈峰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杨光斌教授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陈周旺副教授担任学术评议。

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带来了《把政治文化找回来——“公民文化”的理论与经验反思》的报告，他指出阿尔蒙德和维巴《公民文化》一书中所提出的“公民文化”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因受当时特殊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存在诸多理论和经验方面的问题和技术性“漏洞”。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已经对这些理论问题和技术性错误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批判，随之使该领域的研究回归到对政治文化更客观和更广泛的探讨中来。他通过对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阐述，试图说明对“公民文化”这一带有明显政治伦理价值取向的特定范畴进行理论和经验性反思的学术意义。他认为，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规范价值和经验性解释之间的张力，只有在严谨的学术规范批评中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并推动学术研究的完善和发展。政治文化研究范式的回归，为我们研究政治行为和现象，以及更深层政治制度和结构问题，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方法和理论视角。

复旦大学李辉博士带来以定量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学术报告“世俗主义与腐败”。他以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为基础，对世俗主义与腐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程度世俗主义的国家通常伴随着较低程度的腐败。在报告中，李辉博士从理论上对世俗主义和腐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释，他认为首先是世俗主义为建立规则和程序导向的现代官僚体系奠定了基础，其次是世俗主义还与建立清晰的公—私界限有关，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源自宗教信仰逐渐转变到私人领域中去，现代人对于自身公民身份的想象源自对时间和空间理解的世俗化过程。他还指出在：对政治现象的解释中，微观的观念性的因素与宏观的制度因素有同等重要的解释力，只是长久以来被研究者们所忽视。

北京大学朱天飏教授的发言主题是“比较政治学中的理念视角”。他在报告中首先指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理念视角的崛起丰富和发展了比较政治理论，特别是沿着比较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脉络对其进行了反思与创新。朱天飏教授细致介绍了理念视角在三个维度中的展开。一是学科的维度，通过比较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两个领域的特点讨论了前者对理念视角的潜在影响。二是来源的维度，通过揭示利益、制度与理念以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与理念视角的关系直接介绍理念视角的特点。三是认知的维度，通过对社会科学的经验性研究与解析性研究的讨论，介绍了理念视角崛起与发展的科学与人文两个

学术传统的背景。他在最后指出，虽然理念视角在比较政治学里却与制度主义仍有着割舍不清的关系。但无论怎样，理念视角都发展和反思了比较政治理论。

上海师范大学王礼鑫研究员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为个案的研究，探讨了国家学习能力的建构这一问题。他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非竞争性选举体制中，中国的政党-国家如何能生长出强学习（适应）能力？”。王礼鑫研究员从知识论的政策过程视角回答问题，认为竞争性选举体制中的执政者，学习动机具有内生性等特征，但不一定导致强学习能力。但是中国治理体系发展出强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几代领导人多次开展集体学习活动，最终创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这一制度创新是具有危机感的领导人应对适应能力危机而建立起的制度性应对，是学习体制的典范；这一制度既是一种学习过程，也是一种政策过程。

专题三：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前沿趋势

下午 1:40，第三专题讨论正式开始。此专题的主持人是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担任学术评议人是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和中央编译局杨雪冬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钟杨教授带来了“什么是科学的个案研究，什么不是？”的主题报告。钟杨教授认为，个案研究是对具有代表性的、某一类的一个单位(single unit)，或几个单位(即比较个案研究)，所进行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既区别于试验研究，又区别于大 N 的统计研究方法。他指出科学个案研究的原理同试验研究方法和统计研究方法是一致的，即 co-variation(or counterfactual)和 variable control。同时个案研究的运用有被动和主动之分。同时，个案研究在一些情况下对控制无关的环境变量是非常有效的。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杨光斌教授的主讲题目是《复兴比较政治学的根本之道：比较历史分析》。他认为在面对政治学理论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提出大胆的设想，让最为传统的方法即曾经让比较政治学如日中天的历史社会学脉络下的比较历史分析，作为“中兴”比较政治研究的根本之道。杨光斌教授指出西方比较政治学处于衰落之中，在解答“民主与国家建设”的问题时，“理性选择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均显得爱莫能助，只有只能回到比较历史分析。他指出要通过案例研究与比较方法呼唤“比较历史分析”的回归。最后，杨光斌教授分析了“比较历史分析”中的方法之一——案例研究中的“路径依赖”范式。

复旦大学何俊志副教授介绍了“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模糊集方法”。他在报告中梳理了从密尔法到布尔法的发展，以及从清晰集定性比较（csQCA）到模糊集定性比较的发展脉络。在将模糊集比较方法与多值集定性比较方法（mvQCA）和回归分析分别进行比较之后，进一步跟踪了模糊集方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两个新兴领域：时间序列和演绎模型。何俊志副教授还分析模糊集方法的主要问题和应用前景。

华东政法大学高奇琦副教授的演讲主题是“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经典争论与前沿进展”。他围绕“为什么比较？什么可以比较？如何比较”这三个问题展开进行了讨论。高奇琦副教授认为，尽管多数学者在实际使用比较方法时夹杂了归纳知识和控制变量两种不同的目的，但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比较的意义更多在于控制而非归纳。多数事物之间都是可以比较的，但关键是要找到比较的逻辑。相似案例比较和相异案例比较都可以成为比较的基本逻辑。经典的比较方法是在求同法和求异法的逻辑上展开的。然而，这两种方法的实质都是单因解释。而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从单因解释转向多因解释。多因解释转向对于比较政治研究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布尔代数和模糊集合分析的兴起，另一则是事件分析的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李振博士的演讲主题是《西方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前沿：走向理论的制度变迁》。他认为，对于制度变迁问题而言，除了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还应关注制度变迁发生的过程。早期新制度主义（主要是在 2000 年以前）在分析制度变迁方面并不能显示出其应有的解释力；三个流派的新制度主义更适合于解释制度的持续性而非制度变迁。近十年来，有学者提出，对制度变迁，特别是渐进式制度变迁问题不能再仅局限于对制度分析的分类，而应该发展出制度变迁的因果解释链，以形成理论。但是，渐进式制度变迁理论忽略了制度变迁中学习的重要性。即使存在这些不足，渐进式制度变迁理论也为我们将来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

专题四：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前沿趋势

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主持了本专题讨论，北京大学朱天飏教授和华东政法大学高奇琦副教授进行了学术评议。

北京大学王正毅教授带来了主题为“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基础”的演讲。他以一系列问题作为演讲的开始，“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如何发展，这就需要进行比较？发展中国家是作出同样的回答呢，还是不一样的回答？同时民族国家，是作出同样的战略选择？还是不一样的战略选择？不同质的国家是否有不一样的发展战略？”他指出研究国家的对外路径有三种路径：首先是体系路径；其次是以国家的研究路径，把国家看成一种组织和制度，或者把国家看成一个行为体；再次是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最后，王正毅教授指出比较政治学涉及到三个基本问题：分析单位、研究议题和核心概念。

中央编译局杨雪冬研究员的主题演讲是《地方治理的比较研究路径：地方政治的能动者视角》。他认为，地方治理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原因除了其结构性地位外，更在于其越来越突出的能

动性。地方官员是地方治理中的主要力量。地方官员在国家的眼里，在当地社会公众眼里，在自我的评价中有不同的形象。现有的研究路径是把地方官员等同于地方官员，选择个别官员进行研究，或者将同一层级、同一个部门或特定地域中的地方官员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杨雪冬研究员提出要利用“移情”、“通感”与“主体间性”这三种方法来进行以官员为主体的研究，他分享了自己得到的基本发现：同一个政策，不同的执行；个体的能动性与群体的模糊性；中心工作的动员方式与“常规工作”的放任方式。

上海财经大学耿曙副教授做了题为《高墙抑或陷阱？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种理论视角》。耿曙副教授认为发展问题逐步浮现，既有增长模式出现困境。未来发展前景堪忧，对于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而现有的研究是零碎的，缺乏理论视角，同时急于政策建议，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因此急需条理理论视角，帮助洞察问题。他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种理论视角：要素视角和制度视角。

两种理论视角的理论旨趣不同。要素视角强调静态分析，强化体制，而制度视角强调动态分析，倾向于改革体制。

南开大学谭融教授带来了主题为“关于西方官僚制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报告。谭融教授认为，在进行西方官僚制的比较研究中，首先需探寻相应的研究范式，确定研究视角和切入点。其次是采用制度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厘清各国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关系形态。继而在追溯各国官僚制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探讨各国的政治文化以及对其官僚制所产生的影响。由此而进行比较研究，并尝试建构西方各国官僚制的理论模型。

上海交通大学黄琪轩副教授的演讲主题是《产权的政治与巴西“经济奇迹”的中断》。黄琪轩副教授的演讲主要回答了“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巴西的“经济奇迹”为何突然中断”这一重要问题，他展示了巴西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了巴西政治议题的极端化、收入分配权力

化，进而导致巴西产业结构的畸形化与经济增长的债务化的过程。黄琪轩副教授通过巴西的案例分析报告认为，保护产权等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需要政治条件的。在一个财富严重分化的社会，保护财产权固化了社会分化，这样的政治经济结构不仅不能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制度框架；相反，这样早熟的制度安排反而加剧了该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导致经济增长难以持续。

下午 6 点，学术研讨会进入闭幕式。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明明教授主持了闭幕式。复旦大学副校长、“长江学者”林尚立教授进行了总结致辞。

林尚立教授在总结中围绕四个问题进行展开。

第一是比较的问题。他提炼了比较政治学的四大基本问题：如何比较、比较什么、为何比较、比较的路径。第二是政治理论。他认为，现代政治学围绕的是民主化转型。传统政治学和现代政治学的路向是一致的。所有的国家转型是要建构民主政治。所有的国家转型都纳入到民主转型范畴里面。现代国家转型和民主转型是混合在一起；中国的政道理论具有现代意义，中国的政道理论将政治生活看成一种整体性；我们应该来如何理解国家？我们现在是用结构性来理解国家，我们还要用主体性的感知来理解国家。国家并不是对所有人的意义都是一样。中国人对国家的理解是独特的，中国人与国家是一体的内在的。西方人与国家是外在的。同时，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政体进行分类，而马克思认为实际上只存在一种政体。从人的内在本质来看，所有其他政体都是民主政体的变种。专制是民主政体的缺失。第三是讨论文化、制度和行动者。这三种东西要整合起来考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取决于方法论。有时候因为方法论的限制，这三种东西无法整合起来谈论。所以，所有的方法论都会面临缺陷。第四是中国政治研究的问题。中国政治研究与中国政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政治研究应该是多层面的，应该是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结合与互动。同时应该是长时段的，要有历史眼光。

最后，林尚立教授认为中国制度研究 2012 年度论坛选定的主题——比较政治理论的反思和发展，这种专业性的主题和讨论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他感谢各位学者与学生的热情参与，期待 2013 年再聚首。

（CCPDS 陈英波 供稿；国务 审校）

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

编辑：张建梅

审核：陈明明

地址：上海邯郸路 220 号文科楼 605 室

邮编：200433

邮箱：CCPDS@fudan.edu.cn

网址：www.ccpds.fudan.edu.cn

电话：8621-65642463

传真：8621-65642463